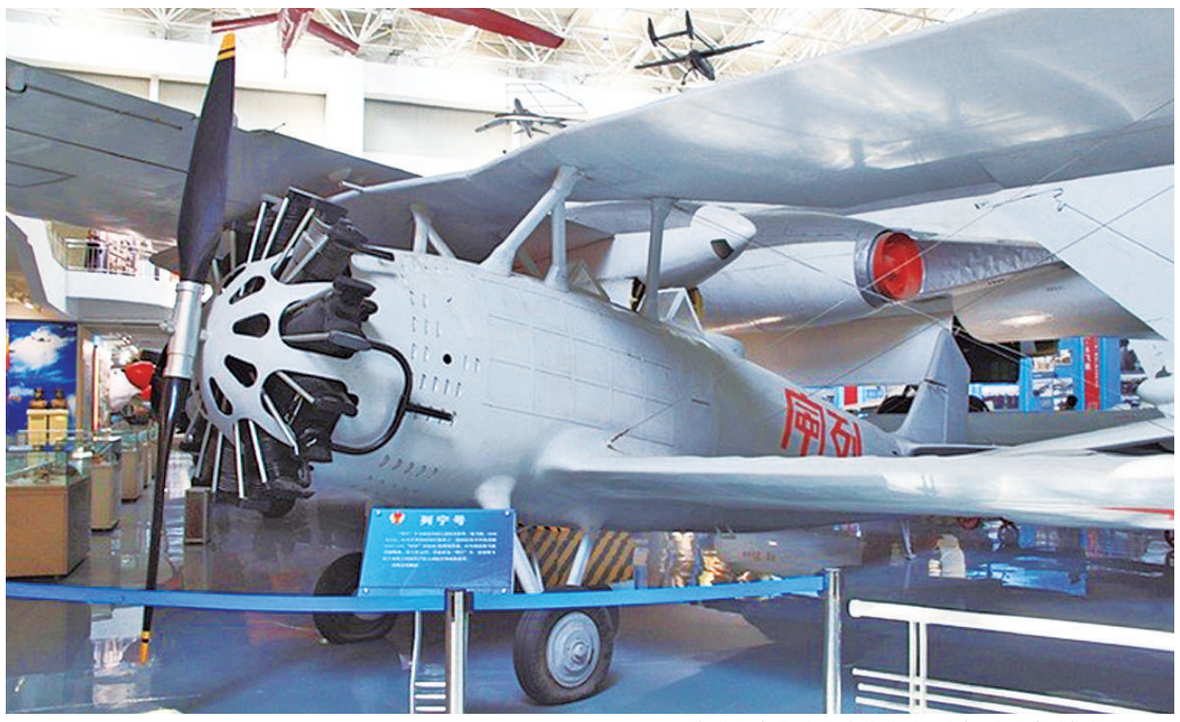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第一架飞机始末

■胡遵远 余 静 王之龙

1930年春，鄂豫皖根据地赤卫队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架飞机，后被命名为“列宁”号，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。



陈列于中国航空博物馆的“列宁”号飞机(复制品)。

意外收获

1930年春日的一天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罗山县赤卫队员发现一架国民党军“柯塞”式飞机沿着竹竿河上游的河道由北向南飞行，摇摇晃晃地降落在宣化店西南陈家河附近的河滩上。

那里是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交界处。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队大队长陈国清，在派人向上级报告的同时，立即带领赤卫队员冲向飞机降落地点，缴获了这架飞机。经询问，飞机驾驶员名叫龙文光，在执行空中通信任务返航途中，遇大雾迷航、汽油耗尽，被迫降落。

中共鄂豫皖特委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接到报告后，指示罗山县委和驻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驾驶员的安全，保护好飞机，并设法把它运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隐蔽起来。

几天后，河西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民团分3路奔袭保护飞机的赤卫队，妄图抢走这架飞机。罗山县地方武装营30多人及时赶到，与赤卫队密切配合，击退了反动民团的进攻，并把他们赶回了“老巢”。随后，红军和赤卫队员拆下机翼，与当地群众一起，小心翼翼地抬着机翼，前拉后推，把机身运到宣化店以东卡房附近隐蔽起来。

被俘虏的龙文光被带到红一军军部，副军长徐向前等人接见了他，鼓励他参加红军、为人民服务。龙文光毕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广东航空学校，曾赴苏联学习，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，他表示愿意参加红军。之后，龙文光接受红军的思想教育，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。

重返蓝天

1931年春，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通过多个渠道弄到不少汽油。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决定将缴获的飞机重新装配。与此同时，鄂豫皖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在新集北侧的普济寺院内正式成立，龙文光为航空局局长，钱钧为政治委员。

机身和机翼要从卡房运至任家畈、黄家畈中间平坦的河滩上重新装配，山高路远，着实不易。在龙文光的指导下，赤卫队员和红军官兵先将飞机拆卸为6块以备运输。沿途工农民主政府从报名参加运送飞机的群众中，挑选了身强力壮者组成搬运队，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。几十里路程，搬运队在沿途群众的支持下，用了半个月时间，把飞机机身完好无损地运到了任家畈。

4月，在龙文光、钱钧和几名懂机械的同志共同努力下，飞机在平坦的河滩上重新组装好，经修复和油漆，飞机焕然一新。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，特区工农民主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“列宁”号，并在机身工整写下“列宁”二字，两侧机翼各绘有一颗红星。中国工农红军在战火纷飞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拥有了第一架飞机——“列宁”号。

因山沟里没法建机场，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将“列宁”号飞机运到新集，同时组织力量在附近修建了一个占地100多亩的机场。为便于“列宁”号起降，又在湖北黄安与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和安徽皖西的金家寨，各修建了一个机场。

7月初，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陈昌浩去英山执行任务，准备搭乘飞机赶往金家寨。红四军总部也准备派“列宁”号飞机飞往固始、潢川一带进行空中侦察。起飞的那天早晨，欢送的群众热情地挥动着双手和草帽，祝贺铁鹰起航。

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遍地泥泞，“列宁”号飞机只得改变航向，飞往固始。固始县城里的敌军听到飞机的马达声，以为是自己的飞机，纷纷驻足观望。当他们看到红五星徽记和飞机撒下的传单后，吓得竞相逃命。“列宁”号飞机又继续飞往潢川、光山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，之后返回新集机场，安全降落。

同年9月8日，“列宁”号飞机从新集起飞，前往华中重镇武汉进行侦察和示威，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较大震动。

首战大捷

1931年11月7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，徐向前任总指挥，陈昌浩任政治委员。不久，红军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、打乱南线敌人的“围剿”计划为目的，决定挥师南下攻打黄安县城。驻守黄安县城的是国民党军第69师赵冠英部，他们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固守待援。黄安被围困月余，敌军几次增援均被打退，但县城仍未能攻克。最后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决定使用“列宁”号飞机，配合红军攻打黄安县城。

12月21日，徐向前、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与飞行员一起，来到黄安县城南勘察敌军阵地，确定“列宁”号飞机作战方案，并组织人员为“列宁”号飞机加装挂弹架，将迫击炮弹捆绑起来挂在飞机上作为航空炸弹。22日拂晓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出对黄安守敌攻击的命令，经过几小时激战，敌军仍在顽抗。

上午9时，“列宁”号飞机出现在黄安城上空。敌军看到飞机后，以为是自己的飞机空投物资，纷纷跑出工事，准备抢东西。岂料“列宁”号左机翼一扇，投下一排迫击炮弹，右机翼一歪，又投下一排迫击炮弹。刹那间，黄安城内响起隆隆的爆炸声，烟雾弥漫，炸得国民党军东倒西歪。国民党军以为他们的飞机找错了目标，忙打信号、布置标志。“列宁”号飞机再次盘旋而来，又扔下两颗大炸弹，同时撒下雪片似的传单。国民党军这才如梦初醒，急忙躲避。与此同时，黄安独立团和赤卫军乘敌慌乱之际攻占了黄安城东北制高点课子山，歼灭国民党守军1个营的大部。

当日22时，红四方面军发起总攻。徐向前率领第12师第35团从黄安城西北角突然袭击，迅速突破城垣，守军5000多人仓皇从城西突围，被陈昌浩率领的第11师、第12师主力全歼于城西南郊倒水河两岸。23日，赵冠英在化装逃往河口镇的途中被赤卫军俘获。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由此取得全面胜利。“列宁”号飞机英勇空袭，配合红四方面军创造了首战大捷的光荣战绩。

1932年，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“围剿”。“列宁”号飞机在根据地群众精心看护下，随红军转移了几个地方，终因战斗频繁，环境恶劣，不得不将其拆卸并埋在大别山偏僻的山沟里。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战斗的第一架飞机，就这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历史上写下难忘的一页。

链接历史

一张通行证 一段长征史

■沐 宸 贾 昊

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纪念馆珍藏着一张纸质“红军没收征发委员会通行证”，长11.2厘米、宽5厘米，上书“步哨同志 兹有袁国钦前往城内请通行 没委华”19个字。这张满是岁月痕迹的通行证，见证着红军长征途中打土豪、筹粮款、分百姓的一段历史。

没收征发委员会(以下简称没委会)早在1930年便已成立，在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门、红军各级政治部、军区及地方武装系统均有设置，统一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没委会管理。《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没收征发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纲要》规定，没委会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、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。

1934年，红军开始长征后，面对敌人疯狂的封锁和围剿，一度面临给养匮乏的困境。为筹措军需、保障后勤，总政治部重新规定红军中没委会的组织，颁发了《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》，规定“从步兵团起至师、军团、总政部，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，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”。红军没委会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，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；没收军阀、官僚豪绅财产，一部分供给红军，一部分就地分给贫苦人民。同时，没委会还负责宣传红军政策、扩大红军影响力。

长征路上，部队每到一处，没委会都要广泛宣传没收征发的目的和意义，并设立群众反馈意见箱倾听民众心声。通过群众检举和摸排调查，了解当地军阀、官僚、劣绅的财产情况，确定没收对象和没收数额，再发动贫苦群众，一起收缴地主官僚和反动军阀剥削人民所得的民脂民膏。同时，还向富商宣传党的政策，动员其为革命募捐。最后，由没委会对这些财产进行整理，留下红军必需品后分发给当地百姓。上文提到的通行证就是红军长征至遵义土城镇期间，为方便群众工作人员出入没委会，特意发放给袁国钦的，后经多次辗转由遵义会议纪念馆收藏。

在进行没收与征发工作中，没委会按照中央领导的指示，严格遵守政策中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，与当地群众合作打击地主豪绅，共享胜利果实。红军在遵义期间，在革命群众的协助下，共没收了遵义城百余户反动豪绅、军阀囤积的粮款，仅反动军阀王家烈一家经营的盐行就查出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。当时，因食盐销路被军阀、地主、官僚所垄断，价格极其昂贵，贫苦百姓吃不起盐。于是，红军将没收来的食盐直接赠予或低价供应百姓。这样一来，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不断增强，军队的后勤补给也得到保障。

在筹粮筹款工作期间，没委会主任林伯渠要求部属严格遵守有关纪律，严禁出现乱筹措、乱没收的现象。在一次入村筹粮过程中，老百姓因听信国民党的恶意宣传，提前把粮食藏好躲进深山，林伯渠带着下属走了好几个村庄，才在一户人家的地窖中发现了两百多斤玉米。看到黄澄澄的玉米，官兵们喜出望外，立马就要往外搬，林伯渠却慎重叫停，让人先弄清这家主人的情况，如果是地主，就按政策没收，并留下没委会的告示；如果是老百姓，要按市场价格购买，并留下字条以表感谢。后经调查分析，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，最后按林伯渠的指示，把信和钱压在炕边，这才将粮食背走。

在我军早期革命斗争过程中，没收征发委员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它不仅是红军在革命道路上筹措军需、保障后勤的重要机构，更是党和人民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。这张通行证的背后，既透露了红军后勤保障的艰苦不易，也为我们留下了共享革命成果、巩固军民关系的宝贵经验。

推波助澜引浊流

——中国古代战争的“水攻术”

■洛旭阳

连环画中的水淹七军图。

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”遍布大地、四时不竭的流水，蕴含着极大的势能。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，水攻是战场攻防的重要战术之一。高明的将帅在沿着江河作战时，时常通过战场施工驱动流水，把水的势能转化为雷霆万钧之力，形成摧枯拉朽、破敌破城的战场奇效。

引水灌城，是水攻的常见战术。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有限，且处在冷兵器时代，高大坚固的城墙，就是极好的防御。对于攻城的一方，坚固的城池是最大的阻碍。为克服这一障碍，他们往往采取堵塞水流、改变河道等办法，将流水引向城墙，利用水流冲击或者短期、长期浸泡，达到冲击、毁坏城墙的目的。公元前512年农历十二月，吴王率兵伐徐。徐国君主踞城为守，等待楚国援军。眼看徐城坚固，攻打不易，吴王为赶在楚军来援之前攻下徐城，决定采取掘壕筑堤的办法引水灌击徐城。徐国君主见状，自知守城无望，只能出城投降。公元前279年，秦将白起率军伐楚，一路攻打到楚国别都鄢城。楚军主力在鄢城顽强抵抗，秦军屡攻不克。白起考察了周边地形与水利条件后，决定利用夷水从楚西山长谷出而流向东南的有利条件，在鄢城城西筑堤蓄水，并修长渠直达鄢城，而后开渠灌城，淹死城中大量守军。秦军趁机攻占鄢、邓、西陵等城。次年，秦军进占楚都郢城，迫使楚国迁都于陈。到了西汉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，消灭赵王刘遂采取的也是引水灌城战术。当时，刘遂引兵据守邯郸，汉军久围不克，直至汉将栾布平定齐地也没有攻下。最终，栾布下令引水灌击邯郸直至城破，刘遂绝望自杀。

以水分割，是水攻战术的进一步发展。古代军事家利用水流强大的冲击力分割敌军，进行围歼。公元前204年农历十一月，楚齐联军与汉军对峙于潍水两岸。汉军统帅韩信下令连夜赶做1万多个沙袋，堵住潍水上游。次日，韩信带领部分军队渡过潍水与楚军交战。刚一交手，韩信率领的汉军就假装不敌，向后败退。楚将龙且中计，指挥楚军渡过潍水追赶韩信。韩信传令上游汉军挖开堵塞潍水的沙袋，汹涌而来的河水顿时把楚军冲成两截，渡河中的楚军伤亡无数。水攻战术，由此成为扭转潍水之战战局的神来之笔。

以水淹敌，是中国古代名将歼灭敌军的重要战术。据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公元219年农历七月，蜀国大将关羽出兵攻打襄阳、樊城，曹操派大将于禁、庞德去樊城救援。农历八月，天降大雨，汉水暴涨，平地涨水数丈。于禁、庞德率领的北方部队既无抗涝经验，也无水军随行，扎营地选在低洼地带，很快就被大水淹没，于禁、庞德等将领上堤避水。而长期坐镇荆州的关羽，不仅扎营在地势高处，还趁机出动水军，乘船猛烈攻击被大水所围困的曹军。蜀军在大船上向曹军避水的堤上射箭，曹军死伤落水被俘者甚多。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“水淹七军”的历史由来。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公元622年，李世民奉唐太祖李渊之命，讨伐叛乱的刘黑闼部。双方在洺水县一带展开大战，李世民多次派出奇兵切断对手粮道。两军相持60余日后，李世民预料刘黑闼粮草已尽，必来决战，于是命人在洺水上游筑堰截断河水。之后，刘黑闼率2万步骑兵南渡洺水，逼近唐营列阵。两军从中午打到黄昏，长期缺粮的刘黑闼部渐渐退入干涸的洺水河道。这时，李世民传令决开洺水，河水疾速冲下，水深丈余，河道中的刘黑闼军被大水冲击后，首尾不能相顾，数千人被淹死，李世民乘胜分割包围，又歼灭敌军万余人。刘黑闼仅率残部逃亡。

流水不仅可以用来进攻，还可以用来防御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古人就围绕城池周围挖掘壕沟，引入河水形成防御，后来发展为筑城必备的护城河。据史料记载，春秋时期的宋国都城睢阳，城东与泗水相通，城南紧靠濉水(又称睢水)，城西有渔水，城北有丹水和五石河。河水之间，还嵌有湖泊沼泽。正是在河湖四面环绕的保护下，楚军多次攻打睢阳，始终未克。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后，楚军一路衔尾追击，进逼至宋都睢阳城南的濉水南岸。次日清晨，正在渡河进攻的楚军，突然遭遇濉水暴涨。渡河的楚军兵马被激流淹没，淹死上千人。楚军遭此意外挫折，不得不自行撤退。这场意外的“水攻”，挽救了宋国的命运。从秦汉三国到五代十国，护城河发展成为城市的标配，水攻、反水攻的技术不断得到完善。公元1213年，南宋名臣方信孺担任真州知州。上任后，他下令沿北山建造石堤提前蓄水，石堤绵延20多里。后来，金兵打到真州城下时，守将命人挖开大堤，将之前积蓄的水流倾泻出来，金兵在激流的冲击下大败。

中国古代军事工程与战法

无师自通研制“防空火箭弹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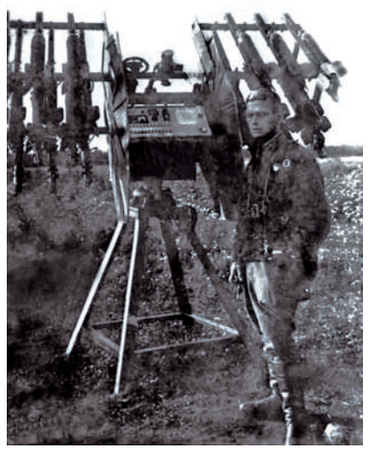
■牛 颖

1941年11月14日，2架德国容克-88轰炸机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，准备对苏联第4集团军北部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萨罗扎村实施轰炸。突然间，天空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并伴随着划过一道令人目眩的火光，德国长机瞬间变成一团火球，吓得僚机立即把炸弹扔向沼泽地，迅速进行防空机动，侥幸捡回一命。创造这一防空战例的是苏军少尉尼古拉·巴拉诺夫。他无师自通地发明了击落德军轰炸机的“防空火箭弹”，并在此次实战中首战告捷。

卫国战争爆发后，巴拉诺夫迅速响应号召、应征入伍。之后，他担任了高射机枪排长并获得少尉军衔。在针对敌机的多次实战中，他敏锐地发现排里装备的4挺合组的“马克沁”机枪防空能力有限，无法对付来袭的敌机。偶然一个机会，他发现附近机场有个仓库，里面存放着RS-82型和RS-132型火箭弹。早在诺门罕战役中，苏军飞行员曾驾驶伊-16战斗机，对日军使用过这些火箭弹并取得不错的战果。

巴拉诺夫向上级领导提议允许他对这些火箭弹进行改造，用于对敌防空作战。当时，德国掌握着制空权，巴拉诺夫被允许放手一搏。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钳工，巴拉诺夫首先画出设计草图，然后在野战飞机修理车间制作试验样品。这个“防空火箭弹”发射架结构简单，即在钢管制成的框架中间安装一个82毫米火箭弹发射操纵台，再在两侧为12枚火箭弹设置上下两层的导向装置。整体钢管框架固定在一个轴承上，再固定在一个非常结实的钢角装置制成的台架上。控制仪也别具匠心，巴拉诺夫从报废的歼击机上拆下射击装置，再从轰炸机上拆下炸弹投掷装置，对两者进行改造组装，便得到一套操作简便可靠的控制装置。整个发射装置安装在吉斯-5型卡车底盘上，机动性较强，只要运到阵地上守株待兔即可。

巴拉诺夫自行研制的“防空火箭弹”不仅可以遂行防空任务，还能打击地面目标。自从德军的容克型飞机被这种“防空火箭弹”击落后，德军飞行员再也不敢光天化日之下飞到巴拉诺夫所在地区捣乱。苏军领导人大喜过望，很快便按照巴拉诺夫的设计草图，在位于皮卡廖沃的野战飞机修理厂制作出6套对空目标射击装置，其中12枚装弹的发射装置2套，可搭载132毫米火箭弹；24枚装弹的发射装置4套，可搭载82毫米火箭弹。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曾使用它们反击来袭敌机，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。此外，这种半手工作坊方式制作的“防空火箭弹”还曾击落德军多架轰炸机，甚至还打下过一架梅塞施密特式高速歼击机。1942年春，巴拉诺夫荣获红旗勋章。不过，这种“防空火箭弹”射击精度远远落后于1941年之后大规模生产的高射炮，因此未在部队得到更广泛应用。



巴拉诺夫与自制“防空火箭弹”发射装置合影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发行电话：(010)66720745 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.57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(地址同社址)